



# 技、道、艺的融合：黄庭坚《王纯中墓志铭》 的三重价值探赜

李超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16)

**摘要:**黄庭坚书《王纯中墓志铭》具有文献、文学与书法三重价值。在“技”的层面,他运用“春秋笔法”与细节叙事,打破了墓志铭写作的程式化窠臼,成功塑造了王纯中“不俗”的人格风神,实现了从生命哀婉到精神超越的升华。在“道”的层面,揭示了黄庭坚对“廉洁奉公”的儒者气节的推崇、在党争背景下“向内建立”的生命安顿智慧,以及视文章为“千秋之业”以抗衡“史笔芜秽”的文化信念。在“艺”的层面,论证了黄庭坚在承传苏轼“尚意”书风基础上的裂变与创新,其独特的“以侧取势”笔法、奇正相生的“辐射状”结体与“潜气内转”的章法,共同构筑了动态而富含金石意趣的视觉空间。

**关键词:**黄庭坚;《王纯中墓志铭》,春秋笔法;儒者气节;以侧取势;

收稿日期:2025年12月19日

中图分类号: I253.4

通讯作者:李超,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Taoism and Art: on the triple value of Huang Tingjian's Wang Chunzhong's epitaph

Li Chao

(School of Art,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Jiangsu, Nanjing 210016)

**Abstract:** Huang Tingjian's epitaph of Wang Chunzhong has three values of literature, literature and calligraphy. At the "technical" level, he used "spring and autumn brushwork" and detailed narration to break the stereotype of epitaph writing, successfully shaped Wang Chunzhong's "good" personality and spirit, and achieved the sublimation from life sadness to spiritual transcendence. At the "Tao" level, it reveals Huang Tingjian's admiration for the integrity of the Confucians who are "honest and upright", his wisdom of "building inward" in the context of party struggle, and his cultural belief that the article is a "eternal cause" to counter the "filthy history". At the level of "art", it demonstrates Huang Tingjian's fission and innovation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Su Shi's style of "advocating meaning". His unique writing method of "taking potential from the side", the "radial" structure of Qi and Zheng and the composition of "potential gas turning inside" jointly build a dynamic and rich visual space of gold and stone interest.

**Key words:** Huang Tingjian; "Wang Chunzhong's epitaph", written in spring and autumn; Confucian integrity; Take the potential from the side;

北宋文坛巨匠黄庭坚所撰墓志铭,迄今可考者凡四篇。其中《王长者墓志铭》与《宋故卢南

诗老史翊正墓志铭》二篇,未见碑刻实物,仅以墨迹草稿传世,已被收入黄庭坚书法作品全集。



另两方墓志则为青石材质，均出土于江西省修水县（宋代分宁县），分别为《徐纯中墓志铭》与《王纯中墓志铭》。前者墓主徐纯中与黄庭坚具中表之亲，关系密切；后者所志王纯中，不但是黄庭坚的忘年之交，其子亦与山谷有旧，因而在文本内容与书法表现上皆具特殊意义。《王纯中墓志铭》为青石质，呈正方形，边长八十八公分，志文共计七百七十一字，周缘饰以连续卷草纹，形制庄重。墓盖形制相类，上篆“宋朝奉郎王君墓志铭”，篆者杜炎，《宋史》无传。墓主王纯中（1025 - 1086），皇祐五年进士，历官杭州司户参军、鼎州桃源令等职，后因丁忧及兄长丧事去官多年，复出后历任唐州录事参军、著作佐郎，终官知洺州。据墓志所载，他为官勤勉，“号为能吏”，政绩受到朝廷与地方的肯定。然而在传世文献中，其生平记载极为有限，仅《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其在通判泗州时参与高丽使接待礼仪一事，以及张舜民《郴行录》中提及的相见之事。史料之稀，更凸显该墓志在补苴史实、还原人物上的重要文献价值。作为黄庭坚文集中未收之佚文，此墓志不仅因墓主属黄氏敬重的“丈人行”而在内容与书写上格外用心，更因其撰书年代处于黄庭坚艺术风格成熟的关键时期，成为探究其书法演变与文体特征的珍贵材料。基于此，本文拟从“技”“道”“艺”三个维度，系统分析《王纯中墓志铭》在文本构造、思想意涵与书法艺术等方面的综合价值，以期深化对黄庭坚墓志书写实践及其在宋代理学文化背景下文人志墓传统之理解。

### 一、文本析微：史笔、诗意与风神刻画

墓志铭作为一种实用文体，通常包含“志”（散文部分，记述生平）与“铭”（韵文部分，表达颂赞与哀悼）两部分，其写作极易流于程式化的歌功颂德。而黄庭坚则以其深厚的史学修养与卓绝的文学才华，打破了这一窠臼，将《王纯中墓志铭》写成了一篇血肉丰满、风神兼备的传记文学佳作。

#### （一）春秋笔法：于细微处见精神

黄庭坚作为北宋诗文大家，他既推崇“无一字无来处”的学养根基，又主张“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创新精神，其精髓在于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这一创作理念在《王纯中墓志铭》体现得尤为显著。首先，黄庭坚在史传书写方法上，

创造性地将《史记》中通过典型细节刻画人物性格的笔法运用于墓志铭创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春秋笔法”。这种笔法的精髓在于“于细微处见精神”，即不依赖空泛的形容词堆砌，通过精选具有代表性的生活细节和人物言行，在看似平常的叙述中自然展现人物的品格风貌。黄庭坚与王纯中为忘年之交，也正是基于对传主的深入了解，才能从纷繁事迹中提炼出最具表现力的片段。

其次，黄庭坚在记述王纯中为政之绩时，摒弃了传统墓志罗列政绩工程的俗套，精心选取了其“公私以济”的场景。墓志记曰：“洺州河决后，民在丘陵，官寺府库，穷于水火。君调用财力，不疾不徐，劳民劝功，公私以济。及君丧行，倾城出祖祭，哭者皆失声。”这段简洁的叙述蕴含着丰富的叙事智慧。“调用财力，不疾不徐，劳民劝功，”既显其爱民如子的亲和力，又见其办事干练利落；而“倾城出祖祭，哭者皆失声”的描写，则通过当地百姓的反应，从侧面烘托出王纯中为官的不仅追求勤政，更富于道德感化力，实现“安居”的理想境界。黄庭坚这种艺术手法正是对《史记》中“互见法”与侧面烘托笔法的创造性继承，与司马迁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通过门客的背离去展现廉颇的权势变迁，可谓异曲同工。

再者，黄庭坚在描写王纯中的孝行时，以“身济大事，持丧甚有礼意”，将孝子的形象刻画得具体而感人。这种书写不仅继承了《礼记·曲礼》中“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sup>[1]</sup>的孝道精神，同时也将其化为平实而深情的日常叙述。这与《三国志》中陈寿记载华歆“歆少以高行显名，避西京之乱，与同志郑泰等六七人避世。自武关出，遇雨，期不进，乃相谓曰：‘如此而行，不过数日，必为禽矣。’歆曰：‘今已至此，去将安之？且人患无德义，不患不富贵。若德义不修，虽富贵，孰能免患乎？’”<sup>[2]</sup>的笔法相较，同样显现出了黄庭坚善于在细微处展现人物的精神境界的笔法，使德行通过具体行为自然流露，而非依靠抽象评价。

刘勰《文心雕龙·诔碑》曾言：“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sup>[3]</sup>黄庭坚正是以其史家之才，通过细节的精选与意境的营造，打破了墓志铭写作中惯有的谀墓风气，创造出一种既真实可信又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人物书写范式，



实现了“其叙也要该，其韵也要弘”的艺术效果。

## （二）人物风神：对“不俗”人格的推重

黄庭坚作为宋代士人精神的杰出代表，他毕生推崇“不俗”的品格，曾在《书嵇叔夜诗与侄榎》中明确提出：“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sup>[4]</sup>在黄庭坚看来，“不俗”的境界绝非简单的特立独行，而应是建立在深厚学养与道德自觉基础上的精神超越。在《王纯中墓志铭》的创作中，他通过精心选取传主生平的关键片段，将这种抽象的人格理想转化为可感可知的具体形象。黄庭坚在记述王纯中对待朝廷巨额的税赋时，他没有被动的接受，而是基于实际的民情毅然发声。他说：“门故有铁赋，以给船官，船官罢而民输赋如故；铁治涸，民取铁他州，以供赋，价数倍。君请以田宅代铁赋，州上之，汔得清，民甚德君。”这种选择的背后所体现出的正是黄庭坚所推崇的“仁”的精神本质，并由此凸显出了宋代士人内求诸己的道德自觉。

可以说，黄庭坚以“以小事见大节”的叙事策略，塑造了王纯中的“不俗”人格形象。通过为民请命展现传主的精神境界，这种写法不仅继承了韩愈、欧阳修等人开创的碑传革新传统，也与朱熹《近思录》中“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sup>[5]</sup>的思想相呼应。

## （三）铭文之思：从哀婉到超越

墓志铭这一文体，自魏晋以降便形成“前散文，后韵文”的固定体例，其中“铭”文部分不仅是全文情感的凝练与升华，也是作者生命思考的集中呈现。黄庭坚为挚友王纯中所作的铭文，以其精妙的文学技巧与深刻的生命哲思，将这一文体的表现力推向新的高度，展现出从个体哀婉向精神超越的升华轨迹。如“好德若不足，以自金玉。不上交以福，媚于菑独。濡之嘘之，汔民有谷，为民父师，子弟率育。俾而寿而康，奈何不淑！在今其子孙，敬忌尔德。非此其身，尚膺为禄。”这句铭文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感结构与思想脉络，以预言式的笔调宣告王纯中的精神必将跨越时空，感召后世。这一转折使全文境界豁然开朗，巧妙地将个体的生命价值从有限的寿夭提升到无限的精神传承之中。

从文学传承的角度看，黄庭坚在尊重事实的

基础上，将深刻的生命思考与高超的文学技巧相结合，使铭文既保持“尚实”的本质，又达到“稟华”的境界。与韩愈《柳子厚墓志铭》的激越慷慨、欧阳修《泂冈阡表》的深情绵邈相比，黄庭坚此作更显思辨深度与超越情怀。可以说，黄庭坚在《王纯中墓志铭》的铭文部分，构建了一个从哀婉伤悼到精神超越的完整历程。他既未回避生命消逝的悲剧性，又通过对德行不朽的坚定信念，为有限的生命找到了永恒的寄托。这种生命观照，不仅体现了宋代士人深厚的人文精神与哲学思考，也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死亡书写提供了新的范式，展现出黄庭坚作为文学大家与思想者的独特风采。

## 二、精神探赜：墓志书写中的自我投射与道义担当

如果说对文本的文学性分析是“技”的层面，那么探寻黄庭坚写《王纯中墓志铭》时的精神世界，则是“道”的层面，是探寻黄庭坚的儒者气节、精神构建与道义担当。

### （一）“廉洁奉公”的儒者气节

黄庭坚在对历史人物的品评中，始终将道德气节置于首位，推崇坚守道义、廉洁奉公的品格。在《王纯中墓志铭》中，黄庭坚特别突出了王纯中“痛绳治之”的细节：“瑞金前数令以罪去，君至则钩取奸黠主名，痛绳治之，诉为之衰。”这一记载看似平常，实则展现了一个普通士人在利益面前坚守道义的精神境界，也与当时政坛上趋炎附势之辈形成鲜明对比。北宋中后期，党争日趋激烈，士大夫阶层面临严峻的政治考验与道德抉择。熙宁、元祐年间的政坛变幻，使得许多文人士大夫在进退之间难以自持。黄庭坚亲身经历政治风波，目睹诸多士人“变节改操”，深感士风的颓败与气节的珍贵。在此背景下，他为王纯中这样一位坚守道德底层的普通士人树碑立传，是范仲淹“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士人精神的延续，也是对浊世的批判，对清流的呼唤。在王纯中身上，黄庭坚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儒者应该如何在小事上坚守原则，在日常生活中践行道义。

黄庭坚这种对平凡士人的推崇，反映了他重要的思想转变。士人的价值并非必然通过显赫的功业来实现，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坚守内心的道德律令，成就一个堂堂正正的“人”。黄庭坚



在《书幽芳亭记》中明确提出：“士之才德盖一国，则曰国士；女之色盖一国，则曰国色。”<sup>[6]</sup>强调的正是内在德性而非外在成就的价值评判标准，也体现了宋代士人对内在人格完善的共同追求。可以说，黄庭坚在《王纯中墓志铭》的撰写中，无论是痛绳治之时表现出的廉洁自守，还是巨额税赋下的为民请命，都是儒家道义在具体生活中的实践，也是对宋代士人精神的重构。

## （二）生命安顿：从“向外诉求”到“向内建立”

黄庭坚历经宦海浮沉，尤其是绍圣年后的连续贬谪，使他对人生的荣辱穷达获得了更为透彻的领悟，其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即从早期“济世经邦”的外向诉求，转向“反求诸己”的内在建立。这一哲学转向在《王纯中墓志铭》得到了充分体现，《王纯中墓志铭》记载的王纯中痛绳治之、为民请命、公私以济等事迹，看似平凡的琐碎，实则是黄庭坚内在世界的价值构建。这种价值置心于个人品德、家庭伦理与朋友信义的珍视之上，在他的笔下王纯中这个普通的士人，通过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实践，实现了生命的充实与圆满，成就了生命的辉煌。可以看出，在黄庭坚的观念中，生命的价值可以不受外部境遇的制约，而在于主体内在的道德修养与精神建构。

在政治生命几近绝望的境况下，他依然通过对友情的忠诚、对文字的执着来完善和传承个人的道德人格。这种“向内建立”的反向认识使他在极端困境中仍能保持精神的独立与人格的尊严，建立了一种超越时代的精神范式。在《王纯中墓志铭》中黄庭坚通过对其挚友生命历程的记述，既回应了庄子“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sup>[7]</sup>的哲学命题，又启示人们在“不可奈何”的境遇中，也要通过内在德性的建立，实现精神的自主与生命的安顿。可以说，黄庭坚在《王纯中墓志铭》中完成的，不仅是对一位友人的追思，也是对生命价值的重新定义。通过从“向外诉求”到“向内建立”的价值转向，展现了一种在逆境中保持精神独立、在平凡中实现生命超越的可能路径。这一思想成就，使《王纯中墓志铭》超越了普通墓志的范畴，成为中国古代士人精神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 （三）文章为“千秋之业”的信念

黄庭坚身处北宋党争日益酷烈的特殊时期，

他清醒地认识到，官方史书的记录往往难以摆脱当权者的意志，或失之偏颇，或被有意篡改。如他在《答洪驹父书》中就提出了一句看似谦抑实则深具内涵的论断，曰：“文章最为儒者末事，然既学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sup>[8]</sup>其“曲折”既指文章写作的技法规律，又暗含文章承载道义、记录历史的复杂功用。此语表面上是将文章置于儒者事业的末位，实则蕴含着对文章功用的深刻理解。这种理解促使他将目光转向文人间的私人著述，将墓志、行状、书信等文体提升到了“千秋之业”的高度，并视其为承载历史真相与人物风骨的重要载体。

在元祐党争的特定历史语境下，黄庭坚为王纯中这样一位“不可能载于国史”的普通士人精心撰写墓志铭，这种对“千秋之业”信念的践行，使他在政治权利被剥夺之时，将私人写作视为捍卫记忆、坚守道义的最后堡垒。通过为王纯中这样的“小人物”立传，记录了一位普通士人的生平，更通过对其德行细节的精心刻画，构建了一种超越官方历史叙事的记忆体系。这种努力，与欧阳修《集古录》通过金石考据补正史之阙的学术精神相通，但更注重通过文学笔法保存鲜活的历史记忆。使王纯中的名字与德性不被时间淹没，实现其精神的永恒价值。

从文化史的视角看，黄庭坚在《王纯中墓志铭》中展现的文章为“千秋之业”的信念，代表了宋代士人文化自觉的重要面向。它不仅是对一位友人的纪念，也是对历史书写权力的重新定义，对文化传承使命的自觉承担。这种将私人写作提升到历史书写高度的努力，既体现了他作为儒者的历史意识，也展现了他作为文人的文化担当。

## 三、艺境探微：《王纯中墓志铭》的书法美学建构

如果说前面的“技”与“道”侧重于文本内涵与精神境界，那么对《王纯中墓志铭》“艺”的审视，则需聚焦于其作为书法艺术本体的美学价值。《王纯中墓志铭》为黄庭坚楷书之精粹，创造性地汲取苏轼书学精髓，实现了个性化美学建构。其核心价值既在于对“势”的极致追求也有对“意”的深沉表达。

### （一）取法东坡：尚意精神的承传与裂变



苏轼作为宋代“尚意”书风的开创者，其“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的艺术宣言，从根本上动摇了唐代以来以法度为中心的书法观念。黄庭坚在《跋东坡书远景楼赋后》中的论述，展现了他对苏轼书学精髓的深刻领悟。他说：“东坡书随大小真行，皆有妩媚可喜处。今俗子喜讥评东坡，彼盖用翰林侍书之绳墨尺度，是岂知法之意哉！”[[ ]]这段评论不仅为苏轼的“无法”正名，也揭示出黄庭坚对“法之意”的独到理解，真正的法度不在于外在形式的规整，而在于内在精神的自由表达。黄庭坚在《王纯中墓志铭》的创作中，展现出“书卷气”与自然天趣的完美融合，正是对苏轼“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sup>[9]</sup>创作理念的最佳诠释。

苏轼书法以丰腴浑厚的用笔和扁阔取势的结字著称，时人戏称为“石压蛤蟆”；而黄庭坚则自嘲其书如“树梢挂蛇”。这两种看似迥异的风格表征之下，实则蕴含着宋代书家对“势”的共同追求。细观《王纯中墓志铭》，其点画虽不取苏轼的肥厚之态，但在起收转折之间，仍可感受到那种源自苏轼的“绵里裹铁”的笔意——外示柔润而内含刚劲。黄庭坚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将这种内在的“筋力”通过更加外显的视觉形式表现出来，创造出极具张力的艺术语言。在结字方式上，黄庭坚将苏轼横向开展的扁阔体势，发展为纵向开张的“辐射状”结构。这种创造性转化并非简单的方向调整，而是对“以欹侧取姿”这一共同美学原则的个性化演绎。苏轼的欹侧多表现为字形的横向倾斜，以取横势；而黄庭坚则通过重心的高低错落和笔势的纵横开阖，创造出更加复杂的空间关系。在《王纯中墓志铭》中，每个字都仿佛具有向四周辐射的趋势，这就是黄庭坚创新的完美体现。黄庭坚在《题绛本法帖》中曾说：“王氏书法，以为如锥画沙，如印印泥，盖言锋藏笔中，意在笔前耳。”<sup>[10]</sup>在《王纯中墓志铭》中，他在保持“意在笔前”的理性控制的同时，又能将偶然性充分发挥，达到理性与感性的完美统一。这种承传中的裂变，使得黄庭坚虽然取法东坡，却最终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个人风格。

可以说，《王纯中墓志铭》作为黄庭坚楷书的代表作，生动展现了一位艺术大家如何在师法前贤

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的转化。他对苏轼书学的取法，既不是简单的模仿，也不是刻意的求异，而是在深刻理解其艺术精神本质的前提下，结合自身的性情学养，开创出独具面貌的艺术语言。

## （二）以侧取势：动态空间的匠心营构

“势”作为中国书法美学的核心范畴，其源流可追溯至东汉蔡邕《九势》：“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sup>[11]</sup>在宋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历程中，黄庭坚对“势”的理解与表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王纯中墓志铭》作为其楷书典范，最引人注目的正是其极具个性的“以侧取势”之法，这一技法构成了黄庭坚书法美学体系的核心要素。

1. 笔势之侧：刚柔相济的笔墨韵律。在《王纯中墓志铭》中，横画多取左低右高之势，竖画则通过微妙的弧度变化打破绝对垂直的呆板。尤其在起笔与转折的关键节点，常以侧锋锐利切入，旋即调整为中锋稳健行笔，如“史”字之捺，先以侧锋轻掠而起，继而中锋铺毫而下，最终顺势出锋，整个过程如太极运掌，刚柔相济。创造性地运用侧锋与中锋的交替转换，形成骨力洞达而又姿态万千的点画形态。

2. 体势之侧：奇正相生的空间建构。在《王纯中墓志铭》中，黄庭坚彻底突破了唐代楷书“四面停匀，八边俱备”的平衡范式，开创性地建立了中宫紧收、长笔四展的“辐射体”结构。如“之”字的处理，捺画舒展开张，如崩浪雷奔；“申”字中竖挺拔中略带弧度，似万岁枯藤。这些匠心独运的结体方式，使字的视觉重心往往偏离几何中心，或上或下，或左或右，通过主笔的极力伸展与次要笔画的收缩聚散，在不稳定的动态中达成更高层次的平衡，形成强烈的视觉张力。黄庭坚在《书幽芳亭记》中提出的“凡书要拙多于巧”的审美理念，在此得到完美体现。

3. 章法之侧：气脉贯通的整体意境。在《王纯中墓志铭》中，黄庭坚通过上字之右仰与下字之左倾相呼应，前字伸展之笔为后字收缩之笔预留空间，形成“大珠小珠落玉盘”般的错落韵律，将一个独立欹侧的单字串联成气脉贯通的艺术整体。这种匠心独运的章法安排，使作品在规整的碑刻形制中蕴含着音乐的节奏感与绘画的构图美。



4、势与意的融合：书法美学的境界升华。黄庭坚在《题摹燕郭尚父图》中写道：“凡书画当观韵。”他这种对“韵”的强调，使得《王纯中墓志铭》中的“以侧取势”超越了单纯的技法层面，升华为精神意蕴的载体。字势的欹侧不再是形式上的标新立异，而是与墓主王纯中“敦厚慈良”而又“中逾谨伤”的人格特质形成微妙呼应。这种势与意的完美融合，实现了蔡邕《笔论》所倡导的“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的艺术境界，每个字的体势，每行字的章法，都成为传达情感、表现人格的媒介。正如他在《题绛本法帖》中所言：“心能转腕，手能转笔，书字便如人意。”<sup>[12]</sup>《王纯中墓志铭》的创作，正是这一理念的完美实践。

可以说，《王纯中墓志铭》中“以侧取势”的艺术手法，构建了一个充满动态美感的书法空间。从笔势的刚柔相济，到体势的奇正相生，再到章法的气脉贯通，黄庭坚以其卓越的艺术造诣，将中国书法的“势”美学推向了新的高峰。

### （三）金石意趣：笔墨与刀锋的融合

墓志铭作为书丹后刻石的艺术产物，其最终审美效果的达成，实为笔墨与刀工双重艺术创造共同作用的结果。《王纯中墓志铭》在这一艺术维度上，堪称北宋碑刻艺术的典范之作，完美体现了中国书法艺术中独特的“金石气”审美品质。这种审美品质的形成，既源于黄庭坚独特的书学理念与笔墨语言，也得益于刻工精湛的再创造技艺，二者相得益彰，共同铸就了这一艺术瑰宝。

黄庭坚特有的“战掣笔法”在其行笔过程中营造出微妙的顿挫与波动，使线条边缘产生类似“屋漏痕”的无起止之迹的自然涩行效果，创造出富含节奏感与阻力的线条形态。在《王纯中墓志铭》的镌刻过程中，刻工不仅忠实地再现了黄庭坚的笔墨神韵，更通过刀法的运用，强化了线条的金石质感。刻工以刀代笔，在石面上再现黄庭坚笔意时，特别注重表现其线条中的“战掣”效果与“屋漏痕”意趣。这种笔墨与刀锋的完美融合，使得最终呈现的拓本既保留了毛笔书写的韵律感，又增添了金石特有的刚健气息。

宋代金石学的兴起，为书法艺术提供了新的取法资源与审美参照。欧阳修《集古录》的开创性工作，标志着金石学在宋代的正式确立，黄庭坚

身处这一学术氛围中，自然深受影响。他将金石文字特有的古朴质拙之感融入笔墨创作，同时又通过精湛的书丹技艺，为金石文字注入了文人的书卷气息，使其更显沉雄、朴茂、耐人寻味。这种审美特质与黄庭坚毕生追求的“拙”、“古”艺术理想高度契合，使得《王纯中墓志铭》其点画不求光滑流利，反而刻意保留书写过程中的生涩之感；结字不尚匀称平整，却在欹侧中求平衡，既保持了碑刻的庄严厚重，又不失墨迹的灵动韵致。可以说，《王纯中墓志铭》的金石意趣不仅体现了黄庭坚个人的艺术追求，对后世的审美倾向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 四、结论

《王纯中墓志铭》是一座凝聚了时代精神、文学理念、哲学思考与艺术探索的丰碑。在“技”的层面，黄庭坚以“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文学理念，成功地将墓志铭这一极易流于程式化的文体，提升为一种极具表现力的传记文学。他创造性地运用源自《史记》的“春秋笔法”，通过精选“一问得其情”、“辞让巨资”等典型细节，于细微处刻画人物风神，使墓主王纯中“敦厚慈良”而又“中逾谨伤”的“不俗”人格跃然纸上。尤为重要的是，铭文部分所构建的从个体哀婉（“寿不满德，命也何如”）到精神超越（“过者必式”）的情感结构与思想脉络，不仅展现了黄庭坚高超的韵文造诣，也体现了宋代士人对生命价值的深刻哲思，将私人化的哀悼升华为对德行不朽的普遍性肯定。在“道”的层面，黄庭坚通过对一位沉沦下僚的普通士人之褒扬，实则阐发并践行了其“廉洁奉公”的儒者气节观。他将气节的体现从特殊时期的宏大叙事，转向日常生活中对道德律令的坚守，从而为在逆境中的士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精神资源。完成了从“向外诉求”到“向内建立”的价值转向。面对官方“史笔芜秽”的失望，他将私人写作视为“千秋之业”，借由墓志铭这一载体，承担起保存历史记忆、传承文化道义的使命，构建了一套独立于官方史学之外的价值评判与人物书写体系。在“艺”的层面，黄庭坚在深刻领悟苏轼“尚意”书学精神本质的基础上，实现了承传中的裂变。他将苏轼横向取势的欹侧体态，创造性地发展为中宫紧收、笔势纵逸的“辐射状”结构，形成了独特的“以



侧取势”之法。这种笔势、体势与章法的动态营构，共同形成了“潜气内转，波澜起伏”的视觉韵律，使其楷书在法度森严的碑刻形制中，充满了音乐的节奏感与磅礴的生命力。同时，其笔墨中特有的“战掣”笔法与刻工精湛的刀法相结合，生成的“金石意趣”，不仅强化了线条的质感，更与其追求的“拙”、“古”艺术理想相契合，成为其人格力量的物化形态。

可以说，黄庭坚在《王纯中墓志铭》的创作中，实现了文学、思想与书法三种话语体系的完美统一：其文学性的叙事策略服务于对高尚人格的塑造（技以载道），其深刻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书法形式的内在张力（道以艺显），而其独特的书法语言则成为文学情感与哲学思考最直观、最震撼的物质载体（艺为道器）。因此，对此墓志铭的深入研究，不仅是对黄庭坚个案研究的深化，对于理解宋代士人如何通过综合性的文化实践，在历史洪流中完成自我定义、道义担当与艺术不朽的追求，具有普遍的范式意义。

#### 参考文献：

- [1] 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中华书局,2017年11月,第10页。
- [2]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64年10月,第401页。
- [3] 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第98页。
- [4] 黄庭坚《山谷题跋》,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1月,第84页。
- [5]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第2567-2568页。
- [6] 黄庭坚《黄庭坚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2月,第420页。
- [7]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2009年2月,第136页。
- [8] 黄庭坚《黄庭坚全集》,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第733页。
- [9] 苏轼《苏轼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第55页。
- [10] 黄庭坚《山谷题跋》,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1月,第83页。
- [11] 苏轼《东坡题跋》,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1月,第139页。
- [12] 黄庭坚《山谷题跋》,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1月,第62页。

作者简介：李超（1985），男，汉族，山东菏泽人，硕士研究生，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三级美术师，研究方向：书法和美学。